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

——再论郑观应^①

夏 东 元

何谓“一身四任”？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一八八〇年前后几年，郑观应有着四重身分，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成。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例如说某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又由于社会变化迅速，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革命派，等等。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却是仅见的。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一

郑观应是一位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一八四二年出生于号称买办故乡广东香山，他的亲属和戚友不少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外国洋行中充当买办和职工。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上海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都是他的姻亲，上海新德洋行买办郑廷江是他的叔叔，而在宝顺任买办的徐润，则是他“两代相交近百年”^②的世交。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郑观应，由于“小试不售，赴沪学贾”^③，走上了买办的道路，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郑观应于一八五八年到上海，先在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④，继则进入曾寄圃、徐润所在的宝顺洋行工作，一八六〇年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在宝顺期间，郑观应除做买办分外事外，自己也开始做一些生意。一八六八年宝顺停

业，他失去买办的职务，而当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随后就与卓子和承办这个茶栈，经营至一八七一年停业。郑观应在经营和生祥茶栈的同时，与唐廷枢等人一起，出资同外商兴办公正长江轮船公司，并被外国商人多士达推为董事之一。这个董事职位既为外商所推选，就表明该公司名为华洋合营，实际权力操于外商。原来，英商怡和洋行的轮运，被美商旗昌洋行摒出长江，由于英商怡和洋行借吸取华资的力量开办公正公司，因而得以再次进入长江。待它在长江站住脚跟，郑观应等华

① 拙著：《郑观应思想发展论》发表于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本文为“再论”。

② 郑观应：《赠徐雨之观察》、《罗浮梅鹤山人诗草》，上海著易堂下卷二页二。

③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盛世危言后编》（下简称《后编》）卷八。

④ 见《香山郑慎余堂梅鹤老人嘱书》民国三年排印本。

董也就被排挤而成为挂名董事。可见郑观应等人的投资,是被怡和利用纳入它的侵略权益的轨道的。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郑观应参与开办公正轮船公司虽有买办性的一面,但从中得到经验,使他反对外商侵犯华商权益的心情强烈起来。

郑观应除经营和生祥茶栈和公正轮船公司外,还开办荣泰驳船公司。在茶栈停业后,又当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有人说他“腰缠十万上扬州”。郑观应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在他充当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他的资本积累更多了。

一八七三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原来在宝顺洋行当气拉渡号轮船船主的麦某,当了该公司的总船主。麦与郑观应在宝顺同事期间,对郑就很器重,这时他力请郑观应到太古总理一切。郑答应了,并参与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一八七四年二月间,郑观应与太古签订了为期三年的雇佣合同,被聘为总理兼管帐房棧房等事的买办。郑在太古的权力是相当大的,据他自己说:“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都归他和总理船务的美国人晏尔吉商办。郑观应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除用人得当这一重要经验外,主要的是加速船运周期,降低燃料等的损耗,多揽多装客货三条。由于经营得法,太古的营业颇为发达,郑观应曾得意地说:“当太古开办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公司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①这样,在一八七七年二月太古聘请郑观应的三年合同期满时,又续订了五年聘请合同。

郑观应在太古任买办的八年间,个人资本积累是快的。他的年俸是七千两,分红等额外收入要比这多得多;他开办了太古昌等揽载行、过载行和其他商号、钱庄等商业机构,赢利是丰厚的。与此同时,他还投资于太古轮船公司,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占股分”。此外,郑观应继开平煤矿的投资入股之后,于一八八一——八二年间,又多次要求与

盛宣怀联合开采山东、锦州等地五金矿藏,并于同年主持集股开设造纸公司^②。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八七八年创办伊始,他即有资本投入,电报局于一八八一年起也有他的投资。郑观应在一八八〇年前后几年已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了。

郑观应与徐润等人有所不同,他没有独自开办工业企业,在一八八〇年前后四、五年间,他的资本大多投于洋务企业。投资于洋务企业的人算不算民族资本家呢?我曾经说过,洋务工业企业包括军用工业在内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胚胎^③。这是从总的即整体方面说的。在“胚胎”时期,它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否完全一样?在洋务运动时期,各个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是否完全一样?某一企业的前期与后期,例如招商局在一八八五年委派督办的前与后,又是否完全一样?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不管怎样,民用性的洋务工业企业的投资者,不少是具有民族资本家性质的。拿经元善来说,一八八一年上海电报局创办时,他占的股份包括他招的股达八分之一,谁也不会把经元善看作官僚资本家,而都认为他是民族资本家。郑观应也应该属于这个类型。

事实上,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从挽回民族利权出发的。他的资本积累虽与外国资本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但由于他发展个人资本的要求不断增长,必然同外国资本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大约在他参与办公正轮船公司被洋商排挤的时候,就对“华商集资附入西人公司股分不愿居华商之

① 以上引文和十条经验见郑观应:《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盛世危言》卷三。

② 郑观应于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致书盛宣怀说:“纸公司集股十五万,挂号者七十余万。洋人亦已另设,恐无甚好处。曾派定阁下三十股,订于(六月)二十(日)收银,如须即交,弟当代付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下简称“盛档”)

③ 见拙著:《论洋务派》,《新建设》一九六四年五、六期合刊。

名”^①的现象很不满意,而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开公司办企业,以收回利权。他根据自己经营商业和同外商打交道中的切身体会,说:“按公法,凡长江内河商贾之利,国人专之。今者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他要求把“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②这表明郑观应把自己发展资本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独立联系了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已打破对外国资本的幻想了。但总的倾向是与买办这个职位分离,民族性在增长。

二

在郑观应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有较完整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一八八〇年中华印务总局刊行的三十六篇本《易言》^③中。在七十到八十年代改良主义思潮兴起时,不少人都谈要变法自强,但他们讲的具体内容,远赶不上郑观应在《易言》中讲的全面和深刻。

郑观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愤怒地进行了揭发。他说外国侵略者“阳托修和,阴存觊觎”,他们“尊己抑人,任情蔑理”地欺侮华人;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实则是“侦探华人情事,欲服华人心”^④的侵略分子,等等。而通商上的不平等郑观应也极为愤慨,说:“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款,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⑤不平孰甚!郑观应从中华民族尊严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益出发,要求华洋人权平等和税收平等。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实行“公法”的交涉上。他说:“交涉事件,折之以和约之经,公法之理,可者许之,必信必果,苟有妨于国计民生者,官可弃,头可断,此事终不可许。彼虽狡狴,其奈我何!”^⑥郑观应在这里

把实行公法的交涉看得太天真和太容易了。当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嘴里说“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但处处不按公法办事,甚至违背公法欺侮中国时,意识到非加强实力地位不可。他说:

“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一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地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⑦

郑观应在这里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公法宜修;二是兵要强武器要精;三是加速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致富。他虽把公法与富强并列,并把公法放在首位,但实际已经意识到只有富强作为后盾,才谈得上运用公法。到九十年代终于明确了“势均力敌,方可以言公法”^⑧的真理。基于这种认识,郑观应把如何致中国于富强作为《易言》的中心。他认为外国侵略者既恃其坚船利炮逞凶于中土,我们就必须师其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他在《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以致《水师》《练兵》《火器》等篇中,都表明了这一观点。而《论议政》和其他关于内政、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文章,都是为了富强这

① 郑观应:《船政》,《易言》二十篇本,一八七六年上海淞隐阁排印本,页四〇;又见《救时揭要》《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文字稍有不同。

② 郑观应:《商务》,《易言》二十篇本,页二四。

③ 《易言》三十六篇本曾于1874年刊印过,郑观应怕“僭且招尤”而收回。随后删并为二十篇本《易言》,从思想体系这个角度看是不完整的。1890年印行的三十六篇本《易言》是比较完整的。

④ 郑观应:《论传教》,《易言》下卷页九。

⑤ 郑观应:《交涉》,《易言》二十篇本,页一一。

⑥ 同上,页一二。

⑦ 郑观应:《论公法》,《易言》上卷页二——三。

⑧ 郑观应:《边防七》,《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卷一〇页二一。

一目的的。他对于学习西学,培养人才,引进技术,提高工效等问题,都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其中不少超过了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而以关于议院制为突出。

设立议院是改良派区别于洋务派的带根本性的标志。当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兴起时,一般思想家在“变法”的命题下大都回避它,而郑观应却在《易言》中列入《论议政》一篇。这就是说,他不仅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且注意到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在六十年代初跟傅兰雅学习英文时,就“究心政治、实业之学”^①了,可见他并不是单纯的“实业救国”。政治怎么改革呢?就是要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有一定民主的议会制度。那时,郑观应还不敢明说在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议院制,而是说这种议院制中国三代时已经有了,“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搢绅相议于学校”,就是这个制度的雏型。只是到了汉唐以后才拿什么“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作为堵塞议政的挡箭牌。大概郑观应惧怕说采用西方议院制而有杀头的危险,所以说西方的议院“颇与三代法度相符”,^②中国实行它不过是“礼失而求诸野”罢了。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触及到变法要害问题的思想家。

三

正当郑观应从一个买办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的时候,也是他去兼任洋务企业要职并进而弃买办专任洋务企业职务的时候。

郑观应到洋务企业中来任职,心情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想搭上洋务官僚们的关系,踏上仕途,经营洋务企业;另一方面顾虑很多,对洋务官僚办企业很有意见,说商人创办的工业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③郑观应认为当时是处于“官之于民,声气不通”,商民“每畏官之无信”^④

的状态。从郑观应这些话和《易言》中的许多论述看,他认为阻碍科学技术和工商业发展的,是清政府的官气太足。所以郑观应不愿到洋务企业中来任职,主要是怕“官”干涉他的企业经营。他的矛盾心理,是商民与官僚的矛盾的反映。这就使他在去就问题上摇摆不定。

首先叙述郑观应参与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曲折过程。由于郑观应经营近代企业的声望颇高,一八七八年彭汝琮到保定向李鸿章揽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是打着郑的招牌。彭汝琮为什么要用郑观应作招牌,得先了解彭是什么样的人。一八七〇年有人向清政府告发彭汝琮的劣迹,湖广总督李鸿章奉命调查,他把调查结果报告清廷说:彭汝琮“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始得离省,其劣迹不问可知。入川曾不数年,招权纳贿之名又播中外。……其贪利虽不承招,而钻营实有其事。”^⑤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被批准去办织布局的。而李鸿章对于郑观应不仅久闻其名,且认为郑是一个“实心好善,公正笃诚”^⑥的人。彭汝琮用了郑观应这个牌子,揽办始得批准。郑观应被札委为会办,这件事,据郑观应说事前毫无所知,接到札委,“实深骇异”,不仅把委札“璧还”给彭汝琮,并要求彭“禀请北洋大臣注销,以免歧误”。^⑦郑观应几经谢绝,最后出于对李鸿章的“遭逢恩睐,优异逾恒”“稍答涓埃”的心情,接受了会办的职务。然而,郑观应参与筹办机器织布局的一年中“局事迄无把握”,而向李鸿章揭发了彭汝琮,

① 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飭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后编》卷八页三一。

② 引文均见《论议政》,《易言》上卷页三八——三九。

③ 郑观应:《船政》,《易言》二十篇本,页三九——四〇。

④ 郑观应:《论火车》,《易言》上卷页一八。

⑤ 李鸿章:《复查彭汝琮等人劣迹片》,《李鸿章未刊稿·奏稿》,同治九年。上海图书馆藏。

⑥ 李鸿章在郑观应“禀辞”上的批语,《后编》卷七。

⑦ 郑观应:《致彭器之观察书》,《后编》卷七。

说他向彭“遇事进言，概置不省”。^①李鸿章对彭作了“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的批示，准予郑观应缴销会办委札，并希望郑“北来一晤”。^②彭汝琮再也搞不下去了。

一八八〇年，编修戴恒、江苏候补道龚寿图等承办织布局，通过盛宣怀邀请郑观应入局襄办，郑复信说：“织布局事，弟才力俱薄，不敢滥竽，前经彭器翁（彭汝琮字器之）贸然稟请会办，弟不胜其任，既已稟辞，不应预闻其事。”表示不愿入局；但也没有完全拒绝，说是“惟大局攸关，中外仰望，倘有所知，若蒙知交下问，又不敢缄默，以期千虑一得之效耳。”^③是年十一月，郑观应被委派会同戴恒、龚寿图办理局务。郑观应在“进退甚难，日夕徬徨不能自释”^④的矛盾心理中，接受了会办的职务。不久，由于织布局需要“有熟悉洋务商务精勤练达之员，提纲挈领，主持全局”，郑观应又被委为总办。^⑤这就以一个外国洋行买办兼任了洋务企业总办的要职。

如果说郑观应接受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职务思想上有矛盾和反复，在受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时则没有什么犹豫。

一八八一年盛宣怀等人拟办津沪电线，他和郑藻如等一起，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驻沪照料验收大北公司代购的材料，及将材料分运各处等事宜。郑观应答复他们说：“窃思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自顾菲材，既承不弃，何敢自外裁成。”^⑥愉快地接受任务并表示在津沪电线建成前不领薪水。郑观应的态度是积极的。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札委他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

郑观应的买办与洋务企业交叉任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在这里可看出洋务官僚们对他的重视程度了。而郑观应在接受会办总办这些兼职时，除织布局因人事关系有犹豫外，并没有什么难色。但是，当需要他脱离太古买办职位来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

办时，却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洋务官僚之所以要把郑观应从太古拉过来任招商局帮办，主要是由于：一、一八七七年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后，七九、八〇两年的赢利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八〇年后怡、太又暗中削价相争，商局复处于不利地位，真所谓“争利连年，亏耗颇巨”^⑦。洋务官僚看到郑观应在太古“总理揽载诸务，与各行商往来最熟，该行日见兴旺”^⑧的事实，认为把他拉到招商局来专办揽载等事宜，对于竞争是有利的。二、这时唐廷枢已专办开平煤矿，无暇顾及商局，一八八一年新派委的帮办张鸿禄经理海运漕米，徐润一个人总办局务是照顾不过来的，熟悉船务的郑观应是理想的帮办。三、一八八〇年以王先谦为代表，参劾招商局“糜费营私”等弊，说什么“归商而不归官，则漫无钤制”，这使商情涣散，而当时招商局正需扩招新股。交游广泛，熟悉商情，为众商信服的郑观应，是稳定商情，广为招徕的理想人物。基于上述，招商局聘请郑观应来帮办局务是顺理成章的。这一次，洋务官僚不是要他兼差，而是要他脱离太古专任商局。还在一八八一年夏秋间，洋务官僚就通过唐廷枢、徐润、郑廷江等人进行试探，郑观应的顾虑是很多的。

其一，从个人前途考虑。太古轮船公司

-
- ① 参见郑观应：《稟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事宜》，《后编》卷七。
 - ② 李鸿章在郑观应“稟辞”上的批语，《后编》卷七。
 - ③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六年五月初七日。盛档。
 - ④ 郑观应：《致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后编》卷一〇页三。
 - ⑤ 参见《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总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后编》卷七。
 - ⑥ 郑观应：《复郑玉轩、盛杏荪、刘萝林、唐景星、朱静山诸君书》，光绪辛巳年。《后编》卷一二页一。
 - ⑦ 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后编》卷一〇页二。
 - ⑧ 见郑观应：《稟谢李傅相札委帮办轮船招商总局》，《后编》卷一〇页二。

有下面的规定,即在太古工作二十年以上年老退休者,准给半薪养老。这时,郑观应在太古已将八年,太古总经理冷士唯恐郑被招商局拉走,为了使他能安心工作,又重申了这个规定。郑观应致书唐廷枢说:“姑不论其言确否?亦足见西人笼络人材,操纵有术也。”他担心,招商局将来“日有起色”,赢利丰厚了,钻营者必多。那时,北洋大臣如果“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①那前途岂不成问题了吗?

其二,从“官督”企业不能尽其所能上考虑。郑观应认为,太古是商办轮船公司,其经营方式完全按近代商办企业的规则办理,没有官场习气,可以人尽其材。到招商局去会怎样呢?照理,他与唐廷枢、徐润是姻亲和世交,自己又有经办轮船公司一套经验,“甚可尽我所能”,但他“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②

郑观应的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顾虑的焦点是对清政府的“官督”持不信任态度。继续在太古当买办呢,还是到招商局来当帮办?考虑再四,不能决定。尽管唐廷枢等人作“无庸过虑”的劝驾,还是“心若辕轳,殊难臆决”^③。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太古合同期满时不再续订,三月二十五日接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札,三月三十日(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就了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职。而把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席交给了经元善。

郑观应之所以决定弃太古而专就商局,原因很多,主要是:第一,郑观应在这时,民族资本家的立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很鲜明,招商局“且占股分”,发展中国的航运业早就很迫切,他从招商局“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欺侮”^④的挽回利权的爱国心情出发,自信“前在各轮船公司经理有年,各商向亦挟

洽”^⑤,他可以把招商局从危局中挽救过来。乃毅然弃太古而就商局。第二,郑观应与太古的矛盾也已很深。他认为自己是有功于太古的人,不仅创办轮船公司有贡献,即“其所用揽载之人及招徕各行章程”,亦是他“为之布置”。然而,郑认为他“为太古经营揽载,吃亏甚重”,而太古不肯弥补他的损失,太古是对不起他的。所以他于一八八一年即已“托词入电局”^⑥了。其实,郑观应同太古的矛盾,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以一个民族资本家又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人,同买办一职是不会长期协调的。弃太古而就商局也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第三,关于薪金收入,郑观应尽管说“不计薪水之多寡,惟恐舍长局而就短局有关名誉”^⑦,实际上薪水也是考虑的。唐廷枢、徐润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而告诉他说:“现拟月奉坐办薪水二百两,年结花红约提一分,大旨每年连薪水可包六千金之祖(数),倘花红上有多,则仍归阁下,决不以六千金为限止也。”^⑧据郑观应说,他在太古的年薪约七千金,商局既能“不以六千金为限止”,个人薪金没有什么损失,这一顾虑也就可以消除了。

脱离太古洋行买办职位,到中国自己办的企业任职对郑观应来说,是一生中的大转折。从此以后,他摆脱了买办的生涯,满怀信心地要运用他的才干,在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上贡献力量。这种愿望是可取的。但在腐

①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后编》卷一〇页二。

②③④ 郑观应:《复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后编》卷一〇页一。

⑤ 郑观应:《禀谢李傅相札委帮办轮船招商局》,《后编》卷一〇页二。

⑥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盛档。

⑦ 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后编》卷一〇页二。

⑧ 《唐廷枢、徐润致郑观应函》,光绪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图所藏未刊。

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使他如愿以偿的。

四

从郑观应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二年间一身四任，可以说明买办、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四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资产阶级本质。郑观应一走上社会首先一个身份就是买办。在充当买办和自己经营商业中积累了资本，尤其是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八年中，资本积累更快。郑观应把这些资本，广泛地投于交通运输、电报、矿务和纺织、造纸等工业，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这说明民族资本家有一部分是来自买办。从思想上说，郑观应既有买办性的一面，也有与买办相对立的一面。反映他六十年代思想水平的《救时揭要》^①，所说“触景伤时，略陈利弊”^②，主要是“触”的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之“景”。反映他七十年代思想水平的《易言》，是“激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③，和以设议院为中心的內政改革等内容，是比较鲜明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产品。就在郑观应以一个买办身份形成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的时候，参加了洋务活动，并成为洋务企业的要员。这些事实表明，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

郑观应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从六十年代萌芽到八十年代初完成，经过了十几

年的时间。特别是在他任太古买办期间，加速了这个过程。郑观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转变，主要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在《救时揭要》的二十四篇文章中，几乎一半是愤怒揭发外国侵略者罪行的。按照郑观应的逻辑，要救时必须抵御侵略，抵御侵略必须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致富强，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实行一定民主的议院制。这种变化的完成，摆脱买办地位也就成为必然。

怎样看待郑观应参加洋务活动这件事呢？是不是他从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转化为洋务派了呢？不是。郑观应是以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他的富强救国的主张的。在他参加洋务活动中，他的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他的富强救国的主张，都没有改变过。如果说他是洋务派的话，那只是从泛义上说的，决不是他的主导面。郑观应既不同于朱其昂、杨宗濂这些人从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也不同于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洋务派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主导面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因此，他不存在从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问题。

① 据郑观应自己说，《救时揭要》于一八六二年著成并交给江苏余莲村刊行，但我看到该书是一八七三年版本，书首余莲村的“前言”和郑观应“自序”都写于一八七二年，全书二十四篇（包括一篇附录），不少涉及六十年代的事，疑系郑观应误记。存疑。

② 郑观应：《救时揭要·自序》。

③ 郑观应：《易言·自序》。